

长安应有学

——评《长安学丛书》

肖云儒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陕西 西安 710061)

由李炳武担任总主编的《长安学丛书》第一批8卷约500万字,最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秦出版社连袂推出。这套丛书将在几年之内出齐百卷,总共6000余万字,统揽自古至今有关长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立论创派,力求勾勒出“长安学”的基本轮廓。中国素有盛世修史、盛世修典、盛世修学的传统。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得好,“每当澄明盛世,集饱学之士子,奉文化之圭臬,修宏图之巨制,稽古佑文,编纂成册,藏之馆阁,传之后世,几乎成为定制。”这既是一种历史责任,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中华民族文化赖以承传的那些光辉典籍正是这样形成的。由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李炳武先生领军,倾全馆文史专家之力,并动员社会各界学术精英合作完成的这部大书,当之无愧属于此类传世之作。在一部煌煌大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次巨无霸式的学术行动。

长安应有学。长安作为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作为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大都会,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较为完备的形态,无论结构的完整和典型,发育的完善和成熟,历史积累的深沉厚实,或是在国家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民族文化版图中的辐射作用,都值得我们在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应该说,构建“长安学”理论体系有着坚实历史文化和学理基础。长安文化素来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芯片,在这

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长安就是研究中国,打开长安就是打开中国历史。

“长安学”研究其实古已有之,千百年来几乎从未中断。像围绕“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展的中华文化发生学的研究;像围绕《诗经》开展的中国文学发生学的研究;像围绕周代礼教和秦代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像围绕汉唐研究发展起来的汉学和唐学;像围绕先秦关中水利建设开展的中国水利学的开篇;像以“留得正气凌霄汉,著成信史照尘寰”的司马迁《史记》而开其先河的秦地史学、中国史学;像北宋大哲学家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关学”(秦地民间有“家尊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并提);像以孙思邈为代表的民族医学和药学;以及近年来兴起的“秦俑学”、“法门寺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无论学科建设是否完备,也无论在学科层面是否得到认可,都以大量的工作和出色的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和人才群落。长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息性和辐射力。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源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说“长安学”是“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窗口,并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对中华文化的研究,都为“长安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 肖云儒(1940-)男,四川广安人,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初读《长安学丛书》前8卷,给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一是发挥了文献功能。它以卷帙浩瀚、分门别类的资料钩沉,史、论、人物、专题、资料全方位展开,为今后“长安学”的研究行了奠基礼。二是注重了学科意识。研究“长安学”,当下最重要的是定位、立论,以宏阔的理论思考将“长安学”的丰富史料向学科层面提升。全书《总论》集中体现了编著者学科意识的这种自觉。该文对“长安学”作了统摄性述评,有大致的学科定位,有宏观策划,有理论先导。对“长安学”的要旨、精义、体系、方法,在学术版图中的地位等等方面,都不乏简要而又精到的论述,是一篇很好的开篇文章。它有助于将相关的微观研究统摄到“长安学”这个大格局中来,也有助于将“长安学”一些最主要的精义渗透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去,对理顺研究思路、在学界寻求共识极有好处。三是显现了包容气象。丛书在收编各类资料时,不存偏见,不加删动,尊重文章的原创性和原生性,为后人保存了有关“长安学”的各种视角、各类观点,并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化,反映出编者的全维的文化视野和科学的宽容气度。这是搞一个贯通古今的大课题必要的学术态度,十分可贵。

作为一项综合性文化工程,长安学研究不仅结晶了浩瀚的文字成果,还形成了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实践相结合的特色。近年来陕西文史馆每年都举办大型“长安雅集”活动,对“长安学”的研究作学术引领和社会弘扬。“长安雅集”专设长安论坛,邀集全国各地专家就“长安学”的某一方面问题研讨交流,在一个高端的、开放的学术平台上,引领、推动、深化学科体系的构建,使个体的、部分的思考成果,尽快转化为整个学界共同的财富。“长安雅集”还通过专场学术报告、吟诗作画和歌舞表演等多个板块、多种方式,将“长安学”研究向舆论延伸、向民众弘扬,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对一门新学科的建构来说,稽古佑文、汇总资料只是肇始阶段的工作。多少先贤以毕生精力开宗立派,成功者盖寡。因而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要聚集

一批现代达摩和现代愚公,执着面壁,不息移山。此前相关“长安学”的研究中,存在“三不少三不多”现象:史料梳理和文物考证不少,对文化内涵作探幽发微的开掘还嫌不多;对古代长安文化的论述不少,对近现代,尤其是当代长安文化的研究还嫌不多;从典籍文化资料(包括庙堂文化和山林文化)着手研究长安文化的不少,以坊间生活中的文化留存,如各种民间风俗、民间艺术以至饮食、服饰文化信息,尤其是以当下鲜活的社会文化心理为对象切入长安文化腠理的研究还嫌不多。我想,当我们在一种群体的、自觉的状态下开展“长安学”的研究时,一定会克服上述的不足,使“长安学”既具有浓郁的理论气息、文化气息,同时也具有鲜活的民间生活气息、现代生活气息,使“长安学”的整体面貌得到改变。

“长安学”的提出,对已有的相关研究不是干扰,更不是否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要重视与原有各类相关研究(比如炎黄文化、法门寺文化、秦俑学的研究)的衔接融通,在已有基础上拿出今天的成果。

“长安学”作为当代人组织的学术活动,应该更加重视理论思维的开放结构,广泛地吸纳各种新的文化学术成果,启动现代性、创新型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对历史的解读其实是对当代的解读。既要宏观、开放的视野给“长安学”及其相关门类定位,又要在关系的研究中揭示“长安学”的全息性和辐射力,在比较研究中(譬如长安学与罗马学,与日本、韩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审视和发掘“长安学”在中国和世界格局中的意义。

另外,除了梳理、总结历史前进、尤其是周秦汉唐盛世的正面经验,也需梳理、总结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种种历史教训。譬如除了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已有的坐标解读历史,不妨也从生态的角度对历史变迁作再认识。气候变化、农业衰败、超负荷社会承载等对长安乃至关中地区历史变迁的影响,就很值得进一步开掘,以警醒今人和后世。